Globethics Repository



何為布爾什維克主義?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Shestov, L.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Rights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ISCS)
Download date	2026-11-04 23:01:26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147

何為布爾什維克主義？

舍斯托夫(Lev Shestov，俄國思想家)
徐衛翔　譯

[編者按]十年前發生的「蘇東」事變結束了「布爾什維克」時代，世界歷史從此轉入另一發展軌道。舍斯托夫是著名俄國基督教思想家，十年前，他的重要著作《在約伯的天秤上》譯成中文，對漢語思想界產生影響。這裏譯載舍斯托夫在布爾什維克革命後流亡法國時寫的文章，以誌這場革命終結十周年。

一、　自我抵達歐洲，所有的人——既有外國人，也有我的同胞——都向我提出同樣的問題：「何為布爾什維克主義？在俄羅斯發生了什麼事情？您是親眼所見的，給我們講一講；我們什麼也不知道，什麼也不理解。把一切都告訴我們，而且要盡可能平靜和不偏不倚。」

平靜地講述現如今在俄羅斯發生的事，是困難甚或不可能的。至於不偏不倚，我興許能做到。

的確，五年來，戰爭使我們對種種恐怖之事已習以為常，然而，在俄羅斯所發生的，卻比戰爭更糟。在那兒，人們在殺戮，殺的不盡是人，還有他們的國家，而對他們的所作所為沒有絲毫懷疑。有人想像他們完成了偉大的工程，相信他們拯救了人類。其他人什麼也不想，只是盡量

去適應新的生存條件，除了日常的利益，別無所慮。明天將會怎樣？對於後者，這一問題無關緊要。他們不相信這個明天，同樣他們也記不起昨天。這一類人構成了俄羅斯的絕大多數——和別處一樣。奇怪的是，乍一看，正是這些人，這些全然為蠅頭小利吸引的庸常之人在創造歷史。正是在他們的手中，掌握着俄羅斯的前途、人類的前途、世界的前途。

這是布爾什維克主義意識形態領袖所不理解的。看起來，馬克思(其歷史哲學借自黑格爾)的門徒和同黨該是富於遠見卓識的，知道歷史並不產生於書齋，也不能像畫布一樣被人隨心所慾地裝進框子。然而，試着把這一點講給目光清澈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意識形態家聽吧，他八成不懂您在說些什麼。假如碰巧他理解了，他的回答準會和從前在沙皇治下回答《新時報》(*Novoie Vremia*)和其他報紙的編輯們(他們承擔了用思想為奴役制度辯護的悲慘任務)時一樣：「這些，都是教條主義」。歷史、黑格爾、哲學、科學：政治家焉能受它們束縛？這樣的政治家決定着國家的命運，國家乃是按照他的正確構想而托付與他的。

人們講到了尼古拉一世，有人向他介紹從莫斯科到彼得堡一條鐵路的計劃，他沒有審查工程師們的方案，就在地圖上兩座城市之間畫了一條近乎筆直的線，簡單迅速地解決了這一難題。這也就是現今俄國領導解決所有問題的方式。要是尼古拉一世的王朝，像其大部分前任與後繼者一樣，配得上無知專制(despotisme ignorant)這一稱號的話，用這個詞來刻劃布爾什維克主義制度則更為貼切。這就是專制，我還要強調，是無知的專制。與最近一段時間那些政治家一樣，布爾什維克們，不但不相信美德(正如人們所知道的，這是政治中所允許的懷疑論)，他們還不

相信科學的進步，他們甚至不相信理智。作為最純粹的俄國政治傳統——所有人心中依然歷歷在目的農奴制的傳統——的有意識的保守者，他們只相信大棒，相信赤裸裸的體力。同樣，在前不久，戰爭以前，在杜馬(Douma)，馬爾科夫(Markoff)和普里什凱維奇(Pourichkewitch)式的右派代表嘲笑自由的人道主義者(l'humanitariasme liberal)，並以絞架和監獄相威脅，來回答反對派的一切企圖，目的在於清除(這是多麼少)我們的舊大臣和與他們反其道而行之的政府人士，而委員們則只知道一種表達方式：「契卡式」(tchrezvitchaiki)。他們確信，政府智慧的深妙之處盡在這個詞語之中。各種自由、個人的保障等等……所有這一切都是歐洲學者杜撰的、意義空洞的詞彙，是西方的教條。在俄國，我們將完全用不着所謂自由和個人的保障！我們將頒佈成千條，甚至百萬條法令，文盲、無知、無能、悲慘的國家，立馬就會變得富足、有教養和強大，全世界都會羨慕，並帶着狂熱從我們這兒來借鑒政府和社會制度的新形式。

俄國將拯救歐洲。我們所有的意識形態宗派分子都對此深信不疑。俄國將拯救歐洲，只因為與歐洲相反，俄國相信言語的神奇作用。多麼奇怪的是，作為狂熱信奉唯物主義的布爾什維克們，實際上卻表現得如同最粗鄙的唯心主義者，對於他們，人類生活的真實狀況並不存在。他們確信言語包含着一種超自然的力量，一切都在言語的層面發生，需要的只是大膽地信賴它。而他們信賴它。千萬條法令如傾盆大雨般落下。無論在俄國，還是在任何其他國家，人們都沒有說得這麼多。從來沒有像這樣，話語回蕩着，卻與實在幾無關聯。誠然，早在農奴制時期，同樣還有在亞歷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治下，人們就談論過，也

做過允諾。誠然，就在舊制度下，政府的言行不一就激起過憤怒和反抗。但是，如今所發生的，衝破了所有的限度。許多城市和鄉村，實打實地在飢寒中掙扎待斃。國力衰竭，非以日計，而以時計。相互間酷烈的恨，不是布爾什維克們所希望的階級間的，而是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恨，在不斷地增長，而與此同時，御用記者(journalistes-fonctionnaires，直譯為記者兼公務員)的鵝毛筆，仍在紙上畫着未來社會主義天堂的詞語，這些詞語對所有人都變得枯燥乏味了。

二、　我稱布爾什維克們為唯心主義者，我指出他們除了赤裸裸的體力，什麼也不相信。初一看，這兩個斷言看來是矛盾的。唯心主義者相信的是言語的力量，而不是體力。但這矛盾是表面的：荒唐的是，人們可以是赤裸裸的體力(自然力)的唯心主義者。

然而，在沙皇俄國，領導層中總是把暴力加以理想化。臨時政府到來時，先是洛沃夫親王(prince Lwoff)，後來又有克倫斯基(Kerenski)，似乎一個新的時代誕生了。事實上，在許多個月裏，俄國上演了驚人的場面：方圓數十萬公里的巨大國家，將近兩億的居民，沒有一個權力機關。因為在一九一七年五月，在政府之層面上，全國的警察機構都被取消了，卻沒有替代它的其他力量。據說，在莫斯科人們開這樣的玩笑；「我們現在靠言語生活」，事實上，人們早就「靠言語」生活了，而且，人們還生活得相對較好。臨時政府盡量避免太嚴厲或太軟弱，更願意靠勸說來行動。必須稱讚的是，直到布爾什維克政變之前，儘管有一種例外的境況，人們還是可以沿鐵路或公路旅行，誠然算不上舒服，可也不危險——至少沒有被剝皮殺

頭的危險。哪怕在偏遠的鄉村，人們的財產也不會遭洗劫。農民們奪取了土地；至於那些有財產者，他們的華宅，他們的個人財富，農民們是很少去動的。一九一七年的夏天，我在圖拉(Toula)政府的一個鄉村度過，而我所叼擾的那位朋友，儘管在當地饒有地產，農民們也沒有找他的麻煩。我自己曾有兩次駕車送一位富有的朋友到二十八俄里(verstes)以外的火車站，其他人也走過同樣的路，所有這些旅行都完成了。這一切似乎都使權力中心確信它的力量乃是真理的力量，並且與政府的老辦法相反，人們不靠強迫組織的手段，而只是出於勸說的力量就能尋求並維護秩序。克倫斯基甚至相信能使不知紀律的士兵去作戰。但只是在試圖用真理取代暴力的臨時政府治下，才有這樣的事情。並且，從這一觀點看，必須說臨時政府試圖實現某個目標，是要在俄國創造一種真理的人的本性，這是托爾斯泰伯爵，克魯泡特金親王(prince Kropotkine)所夢想並講述過的那一類事物，我們的親斯拉夫人士似乎也不覺得奇怪。我很清楚，無論是洛沃夫親王，米留科夫(Milioukoff)，還是克倫斯基都不會粗陋到要在俄國實現無政府主義的理想，但事實上，他們所促成的正是無政府狀態。我們曾有一個政府，我們卻沒有權力，參加政府的那些人，他們的名字掩蓋了權力的缺席。當他們在沙皇時代官員所使用的方法和無所事事之間作選擇時，臨時政府更偏愛無所事事。至於發現新事物，它更是無能為力。取代臨時政府的布爾什維克們也處於同樣的兩難境地，不是沙皇式的方法，就是權力的缺席。缺乏權力，對布爾什維克們而言，沒有任何吸引力，臨時政府的榜樣表明，權力的缺席絕不是像起初不止一個人所以為的那樣無傷大雅，但要找到合適的東西，那些布爾什維克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帶着不

知其任務之嚴重性與責任的人們的鹵莽，布爾什維克們決定完完全全地信賴俄國舊官僚體制的積習慣例。從那時起，任何人，哪怕他再沒有眼力，也一下子就看出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本質與前途了。

顯然革命被粉碎了，而布爾什維克主義在骨子裏是一場反動的運動，甚至比尼古拉二世時更退了一步，因為很快布爾什維克們就明白尼古拉二世的方法不夠他們用了，還必須採用尼古拉一世，甚至阿拉克奇耶夫(Araktcheieff)的政府智慧，於他們，「自由」乃是可憎之詞。他們很快就明白他們掌握的不是個自由的國度，自由的國家裏不會有他們，一如不會有尼古拉一世，亞歷山大三世，也不會有尼古拉二世。對於一個法國人或英國人，這樣一種處境是根本不能接受的，法國人或英國人很清楚一個沒有自由的國家一無可取之處。但俄國布爾什維克們，受的是沙皇農奴制的教育，只有在權力掌握在對方手中時才談論自由，當權力到了他們手中時，便拋棄了所有各種自由，卻連良心的衝突也不曾有過，還以最為瀟洒的方式，就像拋棄資產階級一樣拋棄自由之觀念，資產階級對於已改變的舊歐洲是好的，對俄國而言則毫無價值。一個政府，一種強大的力量，對於人民是必須的，是為了他們的利益，越少徵求他們的意見，他們的幸福就會越大，越牢靠。假如早已死去的尼古拉一世和阿拉克奇耶夫從墳墓中出現，照他們看來，他們將會受到喝采：俄國的反對派，從實現其至高理想的最初誘惑者起，總歸承認古老俄國的政府理想才是正確的。

凡願理解俄國現今所發生之事的人，必須以特別的關注，審視布爾什維克政府創造活動的頭一撥現象。他們以後所作的一切，都可在他們最早的行動中找到端倪。

在此處歐洲，甚至在俄國，興許還有人以為布爾什維克主義含有某種新東西，甚至是某種極端重要的新東西。這是種錯誤。布爾什維克主義不懂得創造任何東西，也沒創造過任何東西。正是在這一點上，它對俄國，同樣是對世界，犯有嚴重的錯誤，正如俄國在經濟、政治和道德上與世界保持着聯繫。布爾什維克沒有創造，它靠以前的東西為生。至於它的內部政治，正如我所說過的，其觀念完全借自阿拉克奇耶夫和尼古拉一世；在外部政治方面，它也沒有表現出獨創性，從它簽訂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約(le traite de Brest-Litovsk)起，到它與歐洲保持一致的企圖(這一點人們現在談論得很多)。在這一意義上，它所做的一切，我們都能看出阿卜杜勒－哈米得(Abdul-Hamid)的亞洲式政治的手法，我們在其行為中常能看到這一點。布爾什維克從來不信賴他們自己的力量，他們比阿卜杜勒－哈米得還不信賴自己的力量。受盡苦難，衰弱無力，飽經內部爭端的俄國不能要求任何東西，也提供不了任何東西。只剩下一件事：捐棄與西歐各國間的不和，着手與英國、法國、意大利和德國談判，指望它們之間利益過分巨大的差異乃至對立，但願到頭來，假如它們之間有了衝突，就可以從它們的衝突中多少得些好處。就是靠着這個辦法，三十年來，阿卜杜勒－哈米得拯救了土耳其。人民在水深火熱中，而蘇丹則穩居寶座；國家日益貧困，幾近破產，王朝的不受限制的權力卻毫髮未損。三十年——這樣一段時間於布爾什維克們就是永恆了，用不了這麼久他們就能實現其目標。什麼目標？這是我們接下來就要看到的。

三、　我希望能按我的理解，盡可能清楚地勾劃出布爾什維克主義中最為本質的東西。我再說一遍，布爾

什維克主義是一種反動；它無能力創造任何東西，它只抓住其雙手碰到的東西，其他人毋須它的合作便能創造的東西。要言之，在本質上，布爾什維克們都是一群寄生蟲。當然，他們自己並無體會，他們也理解不了這一點。同樣，就算他們能理解，他們也幾乎不會公開承認。但在他們活動過的每一個領域，都顯現出他們的本質特性。他們自己也表示，他們的任務乃是：首先要破壞一切，破壞了之後才能開始創造。假如目光清澈的布爾什維克的意識形態家有能力掂量一下他們言語的份量，他們便會害怕。我不是說這樣一種主張是與社會主義的基本教育相矛盾的。用不着說在表明這樣一種綱領的人中，馬克思將認不出他的門徒和同黨。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是社會經濟的高級形式，與資產階級的組織有着同樣的必然性，而資產階級的組織又超越了封建社會的組織，社會主義並不以破壞資產階級經濟組織為前提，相反，它全然地、完整地包含了此前歷史階段所創造的一切。於是，對於馬克思而言，社會主義是一建設性的任務。從資產階級組織向社會主義組織的轉變，意味着走向一種高級的組織，並改進生產；這意味着不是破壞，相反要提高國家的生產力。這是一個積極的課題。布爾什維克們首先拋棄的便是這一課題，尤其是因為他們沒有任何創造的可能性。靠前人創造的東西過活要簡單容易得多，不必辛苦費力。而事實上，總的說來，布爾什維克們什麼也破壞不了。他們是靠從舊的組織中借來的東西生活的。正如有人責備列寧說，布爾什維克們專事劫掠，他回答道：「沒錯，我們在劫掠，但我們是在搶劫被別人搶去的東西」。就算是這樣，就算布爾什維克以各種方式奪取的，是在他們之前被別的力量所獲的東西，事情也並沒有改變；布爾什維克們仍然是寄生蟲，因為，

他們並沒有在前人的創造物上增添任何東西，他們靠吮吸所附着的機體的汁液而獲取營養。

他們能活多長時間？俄國又能供養布爾什維克多長時間？我說不上來。也許我們祖國的忍耐程度和屈服能力超出了我們的全部計算。俄國什麼沒經受過？什麼樣的寄生蟲沒吮吸過她的汁液？我不會去回想十八世紀，伊萬諾夫娜(Anna Ivanovna)和彼得洛夫娜(Elisabeth Petrovna)統治的時期。但十九世紀，在這一方面，依然是令人厭惡的。俄國的官僚機構，隨意支配着俄國和俄國人民，總是出於這樣一種觀點：官員們發號施令，老百姓總得聽話。人們說尼古拉一世，在克里米亞(Crimée)戰爭期間，他的一位大臣建議他在報紙上詳細公佈戰爭的進行情況，彼得堡的居民有些不安和激動了，他回答道：「不安？激動？這管他們什麼事？」

尼古拉一世在其官員之中primus inter pares(出類拔萃者)。每個官員都確信老百姓、居民——俄國從來不喜歡也不接受公民一詞——只不過是發號施令的對象。老百姓有這些主子是幸福的，全部主子的體現便是最高的主子——沙皇。外國人可能難以設想這樣一種狀態，但他們要是理解不了這一點，他們就不能理解布爾什維克主義。俄國的官僚體系總是寄生性的。非但如此，不光是統治階層，整個俄國上流社會，在某種程度上，都過着一種寄生的生活。我回想起，當工作監察員的第一批報告面世時——當時我還是個大學生——一位俄國著名的學者，雅努爾(Yanoul)教授，莫斯科地區的工作監察員，把他在該地區工廠作坊親眼所見的印象概括如下：「俄國工業獲取其利潤，靠的不是工業的方法，即改進生產工藝，而是全然不同的方法，主要是對工人厚顏無恥的欺詐。」

以下是另一個事實，對於那些不了解俄國生活狀況的人而言，它顯得難以置信。托爾斯泰伯爵在他的遺著中講述道，他年輕時曾想獲得一塊新的地產，他曾在無土地農民的居住地尋找這樣的地產。「這樣」，托爾斯泰伯爵說，「我就能免費得到我想要的工人。」

寄生現象是革命前上流社會的特徵，但新的貴族，也就是說鑽進現政府的人，遠勝過舊時的貴族，因此，即便是從這後一種觀念看，布爾什維克主義也不是獨創的。布爾什維克們盡其所能為革命的最基本的任務(解放俄國人民)設置障礙。至為明顯的是，即便是破壞的工作，他們也沒有完成，他們已經破壞了很大一部分國民財富，在監獄，在「契卡」，他們已經殺戮了為數眾多的舊大臣，官吏(tchinovniks)和有錢人。我還沒說完。所有的人都知道拉脫維亞的「契卡」和中國士兵是怎樣行事的，但他們既沒有破壞官僚機構，也沒有消滅資產階級。在俄國，官僚機構從來不曾以這樣的速度迅速繁殖，這是何等游手好閑、可鄙拙劣的官僚機構！在每個機關，都有超過必要十倍的僱員，在十個機關，也難找到一個人在幹活。所有的人，男的、女的、少的，都是官員。布爾什維克們確信，任何不是官員的人，都對國家構成威脅。他們還千方百計迫害不在機構中的人，向他們多徵捐稅，不給他們糧票，把他們送去當兵……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於是人們都成了官員，受過教育的人就徹底地失去一切掙麵包的機會，完全處在被國家僱用的待遇之外。一個普通的人，或者更廣泛地說，一個有體力的人，還可以到鄉下找一份活兒，有了這份活兒，他就能有棲身之地和果腹之糧。但是一位受過教育的人——小學教師，醫生，工程師，作家，學者——卻活該餓死，除非他同意在已然數目龐大的寄生官員幫伙

中加上自己的一份。

那麼資產階級呢？我問自己，它被消滅了嗎？才沒有呢。舊的資產階級是被消滅了。製造商、批發商和他們的主要合伙人，大部分都被消滅了，要不然就是逃亡了。但是在俄國，資產階級比以往更為強大，人數更多，比任何時候都要多出許多。目前，在俄國，幾乎所有的農民都是資產階級。他們在土裏埋着成千上萬，甚至以百萬計沙皇時代、克倫斯基和蘇維埃時期發行的盧布、烏克蘭盧布、以及其他鈔票。人們沒有辦法挖出他們的財富。有了這筆財富，新的資產階級便不再有那在某種程度上克制舊資產階級胃口的傳統。

俄國歷來是特別專橫的國家，契格洛維托夫(Tcheglovitof)、馬拉科夫(Maklakoff)從來不懂，在一個國家裏，何種偉大的創造性力量構成一種明確的權利觀念。他們總是在侮辱人民，並且，在人民的權利和道德觀看來，總是以最令人憎惡的方式。在俄國沒有正義，不要說寬恕的正義，連起碼的公正都沒有。亞歷山大二世設立的法典，很快就被他的大臣們視為沉重的鎖鏈——所有人都保持着一種相對外在的禮節——他們漸漸地擺脫了它，於是法典也就壽終正寢了。人民對此非常清楚。他們知道出於什麼目的設立地方自治會的頭目，為什麼要在鄉下引入體罰。他們痛恨靠一種外在的力量強加在他們頭上的各種機構和權力。但在他們靈魂深處，還保持着對真理的信仰，這信仰在俄國最優秀的文學作品中得到表現。看起來人民過去還信奉過沙皇，他們把他看作是身邊那些奸臣的受害者。但是，經過輝煌的革命，人民一下子就顯得已經不相信沙皇了。多麼奇怪的是，在俄國這麼廣闊的土地上，就沒有發現一座城市或一個集鎮奮起維護被推翻的沙

皇。沙皇走了，一路順風！人們完全不需要他了。人民所尋求的真理並不在沙皇那裏，而是在其他地方，在與沙皇作鬥爭的人們那裏，這就是在革命起初，巨大的成功落到社會革命黨人頭上的理由。真理在他們那裏。他們為人民作出了犧牲，這就是一致的呼聲。女人、姑娘、老者，人們從四處趕來，為真理的人士，為人民的忠烈投票。所有的問題，人們願意用全部的真理，全部的正義，聖俄羅斯的榮耀來加以解決。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黨勝利了。一場不流血的革命——看，這是俄羅斯，而不是腐敗的歐洲，嗯！

四、 就是在這裏，又一次表現出這一部分知識分子的政治無能與乏力。推翻沙皇之後，權力曾經在他們手上。但正如我曾經說過的，臨時政府不知道做任何事情。它名義上執政，卻沒有真正統治。在他們背後，蘇維埃的統治者們，什麼正經事都不幹，卻忙於積聚破壞國家的力量，最大限度的破壞。在蘇維埃人當中，爆發了以社會革命黨為一方，以布爾什維克為另一方的鬥爭。鬥爭的兩派都向人民呼籲。然而，好幾個月內人民卻保持沉默。他們在等待。他們希望政府能找到一種重建國家的方法，並符合活在人民心中的正義的理想。但這政府，它卻拿不出來。它有的只是爭鬥不休的派別，它們又多麼不可能為政府行動作準備。人民，人民的需要，沒有一個人承認，也沒有人願意承認。他們只關心一件事：權力歸誰？同樣，正如人們指望權力將歸於獲得大部分民眾同情的黨派，於是，一種特殊的競爭在這兩派之中形成了，看哪一方將最快地向人民作最多的允諾。他們沒完沒了地允諾許願。一會授權人民可以奪取土地，一會又是動產，等等，

等等。「都是您的，拿去吧！」——各派代表們最後的話就是這樣。慢慢地，人民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們的想法，他們關於權利的觀念，還值不了一枚釘子的錢。過去有的，如今還有，誰有喙和爪子誰就有道理，他能在別人之前動手取食，還能比別人吃得更豐盛。只要主子們還掌有權力，他們就有道理。如今領主們早已被趕走，取代他們的人自己成了主子和貴族。處於內訌之中的社會主義者，沒有注意到，似乎他們到現在也沒有注意到，他們的所作所為正好是他們當初意願的反面。他們的任務包含了在民眾的精神中引入更高社會真理的觀念，但結果是他們從百姓的心靈中驅趕走所有關於真理的想法。

在我們這裏，政治家總是平庸的心理學家，沒有人懷疑過，至今也沒有人懷疑在社會組織工作中人民的權利觀念的極端重要性。我知道布爾什維克們談論了許多階級心理學。但在他們口中，這只不過是詞語，對他們而言沒有絲毫的重要性。在俄國，惟有一些大改革是可能的，必須指出，在戰爭的頭幾年，已然產生了分界線的大移動，將最貧困的一部分人與有產階級隔離開來。在一九一五，尤其是一九一六年，我曾作穿越俄國的旅行，並在鄉村生活了很長一段時間，我也遭受了在很短時間產生的變化的打擊。挨餓的、因恐怖而顫抖的、曾經為我們的作家們濃彩細描的窮人，一九一四年還能見到，此時卻消失了。以前，為了要交給村長(starosta)作為捐稅的一兩個盧布，農民常常要遭受剝削者的人身束縛。然而，他現在不再需要錢。人們已經不再能從他們手中購買黃油、蛋和母雞，除非付得起很貴的價錢。當人們問他為什麼不再賣了，他的回答總是一樣的：「我們自己吃，再說也該有孩子們的」。不過，這也可以理解。自從戰爭爆發，錢就開始流向鄉

村，因為前線所需要的，都得從農民手中獲得。之後有禁止售酒。為了酒，莊稼漢們(moujiks)，每年要付給沙皇成千上萬盧布，此外，酒鬼們還給鄉村帶來雙重的損害。因為俄國的農民，假如手中沒錢，又想要伏特加，他就會把手頭的一切都賤賣掉。啊，現在成千上萬農民的盧布還在農民的口袋裏，在很短的時間裏他從這可怕的對koulak(鄉村貨郎)的依賴中解脫出來了，以前，他就是因為沒錢才落到這種依賴的境地的。

我正好想起我與一位地主的馬車夫的一段對話，一九一六年，我正住在這地主的家裏。

「怎麼了？老爺」這男人問我。沒有辦法和莊稼漢相互理解！你需要什麼，他馬上就對你說：給我五個盧布，給我十個。真要命！以前可全然不同，你只要給老年人一桶*，他們總會把什麼都處理好。人們取消了桶，莊稼漢也就自由了。沒有一次社會革命會像取消酒類專賣給俄國莊稼漢帶來這麼多(好處)。換句話說，正是通過一條至為獨特的道路，一場偉大的革命——政治和社會革命——在俄國得到了準備。但在現實中說發生的，通過革命的理論家對權力的攫取，在另一個方向上推動了我們國家的命運。

我沒有讀過那本著作，我也想不起書名和作者的名字，但有人對我說有一位英國作家寫了整整一本書，想表明俄國被選定扮演馬利亞的角色，相反，歐洲更願意扮演馬大。當然！所有這一類的概括要想接受的話，都得cum grano salis (打點折扣)。但是，在這判斷之中還是有那麼一點真理，而且是很獨特的真理。俄國intelligentsia(知識分子)和俄國人民都太操心天國，卻不會，尤其是不愛考慮

* 即給下人們喝酒的零錢。——譯注

塵世的利益。在沙皇垮台後的頭一個階段，俄國還處在各種自由的蜜月之中，各派的代表還能公開地表達其思想，這是特別令人激動的。不論去哪裏，到處都有人談論俄國的崇高使命。至於俄國的組織結構，沒有人關心，也沒有人去考慮。只要暗示一下這種組織結構，馬上就會引起勃然大怒。別以為我能看到的只是中等知識分子或青年知識人。我所遇到的是俄國思想界最傑出的代表。我還能想起其中一位，至少有一次，他千方百計幫助我抵擋住悲劇事件的發生，而當時，人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威脅的來臨。在我們這裏，也許和到處一樣，甚至尤勝他處，人們可以分辨出大量各不相同的思潮。我們有基督徒，信教者，實證主義者，唯物主義者，唯靈主義者(spiritualistes)。要什麼有什麼。所有的俄國作家首先都是哲學家。政治家和軍事家們非常關心將自己的判斷落實在哲學的基礎之上。而且，我再說一遍，在我們這裏，哲學觀的差異是無限的。但在某一點上意見是一致的。我不想提人名，何況這些人名對外國人而言又沒有什麼意義，但我要申明，我們的作家們最懼怕的，便是一種塵世意義上俄國的良好組織機構的可能性。

「我不願意，為了世上任何東西我都不願意在塵世實現天國！」俄國基督教的代表怒氣衝天地寫道。

「願俄國滅亡，與其以可惡的舊歐洲為榜樣，建立一個時髦的小資產階級的組織機構的話！」一位極左派人士帶着同樣悲愴的情緒叫道。

俄國最著名的詩人之一，在一群同樣是由作家們組成的聽眾面前發表演講，結束時他說：「沙皇已經被我們推翻，但還有一位沙皇——在這兒(他指着自己的頭)。只有趕走腦袋裏的沙皇，我們的工作才能完成。」

我在這裏講述的，沒有絲毫的誇張。小資產階級，或者說在俄國適合這一名稱的階級，其精神中的恨，是全部俄國文學，或者只要你願意這麼說，是全部俄國思想界的口號。正是赫爾岑(Hertzen)首先引入了這個概念。赫爾岑，著名的俄國革命家，畢生都在歐洲流亡。他在尼古拉一世時期離開俄國，相信其最珍貴的夢想能在西方實現。他來到這裏，尋找他的理想，用奧古斯丁的話，我們可以把它叫做amor dei usque ad contemptum sui(愛神乃棄己)，找到的卻是小資產階級的精神，amor sui ad contemptum dei (愛己乃棄神)。在歐洲國家，人們已經趕走了沙皇，但在歐洲人的頭腦中，沙皇依舊穩穩地佔據着。人們考慮的不是天國，而是塵世。人們組織起來，為了今天與明天。人們與貧困、寒冷、飢餓和時疫作鬥爭。人們建立了作坊、工廠和鐵路。人們設立了議會和法院。有時，似乎人們已經能夠解決問題，似乎天國已在塵世實現。還有什麼可怕的！

歐洲人肯定在搖頭。他們知道赫爾岑的理解不能以絲毫誇張來對待：歐洲遠非人間天國，過去是如此，而今也沒有更進一步。從我這方面，我得說，俄國人的這些看法全然是不公正的。當然！假如人們只限於推翻沙皇，而讓沙皇待在人們的頭腦中，我們就不會知道我們現在所認識的那些可怕的事情；俄國也會保持其同一性(unité)，她不會四分五裂；人們也就不會死於飢寒病疫，農民和工人就能呼吸到自由的空氣，就會從數百年的奴役中解放出來。這一切就是人間天國嗎？難道，即便在新生的俄國，她的兒子們就不會有很多的困難和痛苦了嗎？難道小資產階級的歐洲就有這麼幸福？顯然，歐洲人並沒有這樣的確信。但是，在我看來很明顯的是，直到現在俄國人還保持着他們自己的看法。

五、 也許經過這一段偏離正題的話後，人們會更好地理解我為什麼把布爾什維克們叫做寄生蟲。根據其本質，他們不能創造，也永遠不會創造任何東西。布爾什維主義的意識形態領袖們，假如他們願意，他們能把「創造」(名詞)和「創造」(動詞)進行變格變位，但說到實際的創造，他們是絕對無能的。因為奴役的精神彌漫於他們的全部活動乃至他們全部的過於簡單化的意識形態之中，會把任何創造扼殺在萌芽狀態。這便是過去沙皇時代政治家們所不懂的，也是布爾什維克們同樣不懂的。儘管在過去長期的鬥爭中他們就這一主題長篇累牘地討論過，無論是在杜馬還是在地下傳單上。但所有這些論述都被忘得一乾二淨，好像它們從來不曾存在過。如今，在俄國，有的只是政府的報紙和政府的演說家。只有歌頌領導階級之活動的人才能寫書講話。這是個信任的錯誤，農民和工人(布爾什維克們就是以他們的名義進行統治的)比起其他階級只擁有最不起眼的優勢。此外，就像在舊制度下，只有那些思想好的成員，也就是說，那些不會抱怨，相反，對政府的命令百依百順的人，才會有好運氣；而那些持異議的，那些膽敢擁有自己個人意見的人，在如今的俄國不再有立足之地，其地盤會比沙皇制度下更少，少到極點。在沙皇時代，人們可以用一種我們叫做伊索(Esope)的語言表達思想，但我們還是可以說話，不必冒喪失自由乃至生命的風險。至於沉默，過去禁止不了任何人。如今，連沉默都不許。你要想活命，就必須表達對政府的擁護，就必須給它獻上鮮花。我們看到這種情況會帶來什麼結果：大量無能而又缺乏良知的人(對他們而言，稱讚任何人說任何事都無所謂)浮上了政治生活的表面。布爾什維克們，他們自己對此非常清楚，他們對已發生的事情也不乏恐懼。

但他們什麼也不能做，人們也什麼都不能做。有良知有能力的人，出於他們的本性，不會習慣於奴役。對他們而言，自由是必須的，如同空氣。布爾什維克們理解不了這一點。

這裏有一樁關於我和布爾什維克們關係的趣事。去年夏天的某一天，在基輔，我們大樓的門房遞給我一個灰色大信封，上面寫着「致舍斯托夫同志」，我知道這是會議通知。我拆開了，果然是。他們通知我參加一個會議，要討論的問題是「藝術中的無產階級專政」。我按時去了。宣佈開會的是記者R……，他在俄國南部很有名，這是個身材高大、瘦削的男人，典型的俄國知識分子的臉龐。他談吐自如，一望便知是常發言的。沒說幾句話，沒提我的名字，他就讓與會者注意到我的在場，顯然是想讓我不得不說點什麼。但我不想發言，我等待着。討論開始了。出現了一種對立，當然是很適度的。一些作家、記者接連地發言，還有一位著名的詩人加入討論，討論的主題是關於自由藝術。接下來，有個我不知道是什麼軍事組織的代表要求發言。這是個瘸腿的小個子，留一部黑長鬍子。他一開口，大家就知道他沒受過任何教育，適合於店鋪的後間，而不是藝術的領域，是人們說的那種分不清一尊雕塑和一幅畫的人。像這樣的人興許需要聽聽這個會議，來學點東西。但這麼個完全是無知又無能的人，卻充滿了自信。他不是來學，而是來教的。他教的是什麼？是這樣的，他說：「我們要用鐵的手，迫使我們的作家、詩人、畫家，等等……用他們的技巧能力為無產階級的需要服務」。

這通話笨拙、冗長、令人厭煩、拖泥帶水，但其主題總是一個，我們要迫使，我們要強迫，我們要奪取技巧並且要利用它。有人回覆他，我發誓我不理解那些回答他的

人的心理；我也不懂，一般說來，如何能給這種極端無知與粗俗的主張以一個答覆。他再次發言，帶着嘲弄和輕蔑的微笑，如同一個深知其價值的人。在他之後發言的是會議主席。這一位，我已經說過了，是個演講的老手。在他那很有條理的長篇講話中，他宣稱他當然理解剛才做辯護的人們，他有他的美和興趣。但過去的過去了，永遠埋葬了。大革命的風暴掃除了過去的一切。而前面的發言者，黑鬍鬚的瘸子，給藝術界的代表們多麼生動地講述了「用鐵的手奪取技巧」的必要性，正是他揭示了未來。「我自己呢，」主席說，「不久以前我還是[公元前]五世紀和希臘文化的仰慕者。今天我明白了，當我還陷在錯誤中時，大革命一掃除了舊思想」。他還以一種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方式結束講話：「我也曾是一位舍斯托夫著作(他提到了我的名字)的讀者(他說了一長串在我看來是恭維的話，在此省略)，而這兒也有風暴，等等……」

我原本沒準備發言，但這一次提到了我的名字，我不能再沉默了。我只說了幾句。「顯然，」我說，「雖然大家在這談論無產階級專政，但人們尋求建立的，在這一領域，一如在其他領域，只是對無產階級的專政。大家卻不去問一下無產階級他們想要什麼。只是安排了假定可以從藝術家手中奪過來的我不知道什麼技巧來為他們服務。但假如他們真的解放了，他們不會服從你們，也根本不會去追求技巧。他將願意，和你們一樣，享受在藝術、科學、哲學和宗教領域中偉大創造者們留下的難以估量的寶藏。大家在這裏所說的偉大革命掃除並埋葬了許多東西，興許還有[公元前]五世紀和希臘文化，但在歷史中還有其他的風暴，掃除並埋葬了這同一個[公元前]五世紀，而且更徹底。後來，又來了一些人進行挖掘，並在廢墟中尋找希臘

藝術的些微蹤跡」。

說完，我就走了，完全清楚在如今的俄國，引起有關藝術中無產階級專政討論的人們不需要我這番話。但在這次會議上，一如在其他類似的會上，同樣還有在閱讀蘇維埃公報時，我以不容置疑的證據，確信我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也就是說布爾什維克政變之後所了解的東西：布爾什維克主義是一場深刻的反動運動。布爾什維克們就像舊時的農奴制的黨派，夢想奪取歐洲的技巧，卻抽去了這個概念的全部內容。這個概念的內容，我們的沙皇制的「契卡」和布爾什維克們是準備轉賣的。「我們只缺技巧，它是我們將通過力量獲得的。畫家、詩人和學者們，知道了飢餓的折磨之後，便會甘心按我們的好口味進行創作。我們的思想加上他們的才能」。——這就是夢！

很難設想比這更荒誕的事情。但在十八和十九世紀的俄國，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如今也一樣。沒受過教育，無能且遲鈍的人物，在布爾什維克政府之上積聚起雲團，並且把他們以前所有的最好最高尚的東西轉化為漫畫。貧民窟的響亮嗓門，在所有的路口喊叫着荒誕又粗俗的話，而目光清澈的布爾什維克意識形態家們為事態感到驚異和苦惱，尋思着何以在俄國以前的這些無恥之徒，這些最為卑鄙粗俗的傢伙都到了他們一邊，為什麼他們這麼缺乏有價值的人。尼古拉一世看到果戈理的《欽差大臣》(*Revisor*)上演時有着同樣的驚異。但是據說，尼古拉一世還是了解了他的錯誤。戲演完後，他會說：「作為喜劇，這還算一部好喜劇。所有的人均有所獲，朕所獲尤多」。

真的，人們說列寧也會公開承認布爾什維克們發動了一場下流胚的革命(révolution de salauds)。果真如此？他真的說過這樣的話？我未能核查過。不管怎樣， se non è

vero è ben trovato(不是真的那太好了)：布爾什維克官僚機構的全部活動都帶有奴性粗俗的印記。

六、 的確，不管是否有意識，這個農民和工人的政府所做的一切都取決於它要對無產階級實施專政。此外，正如對於歐洲人而言很清楚的，它不可能是別的樣子。我清楚俄國的工人和農民生活在何等的貧困之中，不幸的是，布爾什維克意識形態家們卻一無所知(至於那些惡棍們，他們人數眾多，攀上布爾什維克了，他們倒知道。)這種悲慘狀況的原因，必須到我國的政治制度中尋找。那裏沒有自由——必須時時刻刻不停地向俄國人講這老生常談——它也不能產生任何世上人能夠給予好評的東西。只有舊俄國積習甚深的農奴制擁護者(Krepostniki)和所謂新俄國的人才會對這顯見的道理一無所知。我可以更確定地斷言：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應該被看作是俄國革命傾覆的日子。布爾什維克並未拯救而是背叛了工人農民大眾。最為響亮的句子仍舊是句子，而事實卻還是事實。俄國工人和俄國農民，同樣還有俄國知識分子，他們首先需要的，便是獲得公民的稱號。必須讓他認識到他不是任何有錢人都可嘲笑的奴隸，相反，他擁有權利，神聖的權利，他必須擁有以保護自己，所有的人都擁有以保護自己的權利。所有的人都知道，這是臨時政府在其誕生之初便聲明的。但人權和公民權，一個又一個世紀裏，這不幸的國家所嚮往的權利，仍然只停留在紙面上。事實上，幾個月以後，他們就開始建立舊的專橫制度了。充斥俄國的布爾什維克的法令和數不清的聲明，早就被人民理解和解釋為篡權和搶劫的要求：「能撈就撈，回頭遲了撈不着」。

很難描述從前線搖撼了整個俄國的劫掠狂潮；成千

上萬的士兵回家都是帶着大包小包的戰利品。人們爭先恐後地逃跑。布爾什維克的傳單上充斥的那些什麼團結，什麼國際問題等的大話，從來就沒有被人聽懂過。人民確信今天和昨天一樣，存在的只是暴力，而非正義。誰撈到了就歸誰，大家毫無顧忌地撈着。劫掠之後，跟着便是暗殺和酷刑。沒什麼人考慮工作。這麼容易就能致富，又有什麼好去費力幹活的？在這種彼此間的兇殘和內戰的氣氛中，對實現「人間真理」之可能性的最後一顆火星也熄滅了，這真理本是虛構。在一些城市和鄉村，權力落在罪犯和壞蛋的手中，他們將自己的狼子野心掩藏在美好言辭的面具之下，呼籲人民起來消滅資產階級。

在彼得堡和莫斯科，除了匪徒和扒手以外，確實還有一些人，他們真誠地相信言語的全部力量，他們沉溺與對未來天堂的誇誇其談中，這天堂顯然也逐漸退縮到未來前程的光環之中。眼下所有的，是飢餓，是寒冷，是各種疾病時疫，最後還有不斷增長的人與人之間的仇恨。也不再分有產階級和非有產階級了。挨餓的工人，既恨資產階級，也同樣恨他的同志，這位同志有本事為自己飢寒的家庭多弄到一塊麵包，幾片柴火。

而恨意最為集中的，是在城鄉之間。鄉下堅壁清野，它 mordicus(頑固地)拒絕給挨餓的城市提供任何東西。為了尋找工人和農民之間無論什麼樣的 modus vivendi(妥協辦法)，工人和農民的政府什麼辦法都試過了。為了從農民那裏奪取麵包，他們不得不派武裝報復隊到鄉下去，可常常是空手而歸，還要損失一半乃至四分之三的兵員。任何人只要關心布爾什維克報界，都知道，事實上布爾什維克們從來沒有控制俄國。順從他們的，是那些大城市，那裏的人被血腥的復仇嚇壞了，對其命運多少有些聽之任

之：而在鄉下，也就是說十分之九的俄國土地，從來不是布爾什維克的勢力範圍。它一天天地過着它自己的生活，也許根本沒有中央權力。怎見得布爾什維克政府的權力幾乎未觸及鄉村？最好的見證是烏克蘭軍需官施利希特(Schlichter)在基輔報紙上發表的文章。他對共產主義忠貞不渝。儘管，我們得說，他是個魯鈍無能的人。他的文章很長很詳盡，有兩個月時間幾乎天天都在當地報紙上刊載。這傢伙不是在寫作，而是在叫罵。他的叫罵總是一樣的：「鄉村不給麵包，不給木柴，也不給穀子…… 它什麼都不給！工人們，要是不想餓死凍死，就武裝起來到鄉下打仗去，否則你們什麼也別想得到！」

要是這話是另一個人說的，人們會懷疑他是個挑唆犯。但施利希特卻不受這樣的懷疑。事實上，儘管有個德國姓，他卻是個哥薩克的後裔，不懂得掩飾內心的思想和情感。不管腦子裏有什麼，都會從嘴裏出來。我相信，要是其黨員是誠實的，那麼，早就會明白這個工人和農民的政府得不到工人的同情，也不會獲得農民的支持；而共產主義的思想，因為其自身的緣故，也不會被人民大眾(larges masses)所接受。的確，舊的資產階級不懂得自衛，它被打倒了。但我要重申，資產階級在俄國不但沒有滅亡，相反，它還會像過去一樣茁壯。同時，布爾什維克們在俄國心靈中維護其寶貴利益的方法也再次表明他們如此懼怕俄國走向戰前的歐洲所享受的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幸福，懼怕俄國的兒子們命中注定要去考慮人間天國。我說布爾什維克的方法表明他們其實什麼也不擔心，什麼也不苦惱。按照我們所獲知的今日俄國的情況，他們設立了十到十二小時的義務勞動、計件工資、對工人的武裝監督，等等，等等……。這都很自然。工人不願意拿出產品來，

農民也不願意拿出麵包。然而，他們需要很多的麵包，很多的產品。於是，結果只能是：一方面，必定有一些特權階層，從來不工作，卻用各種可怕的手段，殘酷無情地迫使那些沒有特權，沒有權利的人們從事他們力不能及的工作，他們不惜其健康乃至生命，用他們的勞作為所有的人謀福利。

這就是向工人農民漫天許諾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所帶來的。至於它給俄國所帶來的，我就不說了，所有的人都知道。

布爾什維克意識形態家們還有一條理由，最後一條。「是啊，」他們說，「我們什麼也沒給俄國工人和農民，我們還破壞了俄國。但是不能不這樣。俄國太落後了，俄國人太缺乏教育，接受不了我們的思想。但這既和俄國也和俄國人無關。我們的任務是最偉大的，我們要超過西方，消滅歐美的小資產階級精神，我們要在俄國保留住火種，直到火焰飄至我們的鄰國並讓熊熊大火燃向全世界。這就是我們的最高目標，是我們的最大夢想。我們將把思想帶給歐洲。歐洲會給我們它的技術，它的本事，它那良好的組織，等等……」

這就是布爾什維克的 ultima ratio(最後論據)。它有什麼用？

七、 在我長時間居留在布爾什維克控制的地區期間，我注意到一個非常奇怪的事實。那就是年輕人和智力不太高的人對事件的猜測和預言最準。相反，那些更年長的，或者更聰明一點的人，預測時卻會失敗。他們相信不會長久地控制在布爾什維克手中，人民會站起來，只要好歹組織起一支軍隊，布爾什維克的軍隊就會土崩瓦解，

就像雪見了陽光。事實與有智力有經驗的人的預言相違背。鄧尼金(Denikine)的確拼湊了一支軍隊，並很快開到了奧列爾(Orel)，但布爾什維克們更快，把他們一直趕到黑海。正是年輕人和智力不太高的人作了很好的預言。現在，當人們試圖窺一眼前途時，心裏就尋思：相信誰，聰明人還是不聰明的人？聰明人從他們認為確鑿的立場出發，即人們在行動時都受其至關重要的利益的驅使，人們本能地感覺到何者有利何者有害。對於他們，自然布爾什維克是有害的，它會帶來災害、饑饉、寒冷、苦難、奴役、……他們說，最終它不會持久的。它會持續幾周，甚至幾個月，然後就會自行滅亡。但是，已經過去兩年了，很快就會有三年，布爾什維克主義還存在着。它存在着，儘管飢寒病疫造成動亂。難道指揮人的不是常識嗎？而我們的詩人，為了沒有最後將沙皇從俄國人頭腦中趕走而苦惱的詩人，難道不是錯了嗎？

但是，有人說，俄國人能夠對付苦難、專橫、以及隨便什麼。在俄國，正是那些年輕人和智力不太高的人看得對。在歐洲不是這樣的。

真的與此不同？我可不敢妄加預測。我們生活在一個能夠靠常識的指導進行推理的時代。我不能為俄國布爾什維克主義作辯護。我已經說過，我差不多要重複說，布爾什維克主義是俄國革命的背叛和失敗，並且它不明白，它作了最粗俗最卑鄙的反動遊戲。但是，造成這樣自殺的，惟有布爾什維克們嗎？仔細看看這幾年所發生的事情，所有的人都做了不該做的事情 。誰拋棄了君主主義的思想？霍亨索倫王室(les Hohenzollern)、羅曼諾夫王室(les Romanoff)和哈布斯堡王室(les Habsbourg)！宣戰的那天，柏林喧囂四起，威廉(Guillaume)宣讀了致尼古拉二世的如下電報：

「停止行動。如我們間開戰，我將失王位，您亦然。」也許這樣一份電報從來沒有寄出過。但發出這種喧囂的人自己揭示了預言。並且，從骨子裏看，君主主義的最激烈的敵人並不會發明推翻歐洲君主制的更為有效的方法。假如霍亨索倫王室、哈布斯堡王室和羅曼諾夫王室的理性沒有被某種我說不上來的魔魔法所蒙蔽，必定知道其王朝切身利益迫切需要的不是帝國王冠持有人相互之間的敵意，相反，是一種最密切、最真誠、最忠心的友誼。尼古拉一世對此很清楚，他曾派出俄國士兵前去鎮壓匈牙利革命。亞歷山大三世也很清楚。在他治下，除了法俄聯盟，還有Dreikaiser Bund(三愷撒聯盟)(三位皇帝的聯盟)。但在一九一四年，歐洲的君主接二連三地被趕下台，為了他們最為憎恨的西歐民主制的榮耀。很明顯，有一種我說不上來的命運降臨到他們頭上，那句俄國諺語「人逃不過命」得到了驗證。每個人，每個民族，所做的一切都在加速其失敗——假如那就是他們的命運。

我相信，現在已經很清楚了，對於所有的人，對於德國人非德國人，假如有利益的話，這些利益要求的是我們所意願的一切，除了戰爭，戰爭是與所有人的利益相違背的。事實上，假如德國人把他們用於戰爭的手段和能量都花在建設性而不是破壞性的工作上，他們準會把他們Vaterland(祖國)改造成人間天堂。這話也同樣適合於其他民族。戰爭的開銷大得驚人，超過萬億法郎。我還沒說那些死掉的人，毀壞的城市，諸如此類。我再一次說，假如掌握着其人民其國家命運的領導結構在過去的五年裏能夠理解，並力圖使其人民以一種自我奉獻吃苦耐勞的精神去實現積極的目標，整個世界就會變成阿卡迪亞(Arcadie，指世外桃源。——譯注)，人人都會快樂富足。事實上，

在過去的五年裏，人們自相殘殺，揮霍着盛世歐洲積累起的經濟，到了幾乎要讓人想起中世紀的地步。這一切怎麼會發生的？人們為什麼會一下子就喪失理性的？我只能給大家一個回答，自從戰爭開始，這念頭一直縈繞我心頭。我當時正在柏林，是從瑞士回俄國的途中。我不得不取道斯堪的納維亞，直到托爾內歐(Torneo)，再從芬蘭抵達彼得堡。在德國，我自然只能讀到德國報紙，事實上，甚至在我回到彼得堡之前，我所能閱讀的也只有德國報紙，因為我不懂任何一種斯堪的納維亞語言。只是到了俄國，我才得到俄文報紙。當我看到俄國報紙上逐字逐句地重複德國人所寫的東西時，我十分震驚。顯然，他們只是換了個名字。德國人攻擊俄國人，指責他們的殘暴、自私、他們笨拙的精神，等等……。俄國人也指責德國人同樣的東西。這一切深深地打擊了我，我想起了《聖經》中語言變亂的故事。因為這是真的巴別塔。昨天還在一項共同事業中一起工作，為他們所創造的歐洲文化的通天之塔添磚加瓦的人，今天相互之間不能理解了，只狂熱地夢想着：破壞，摧毀，讓千百年來用耐心和堅忍創造出來的一切，在一瞬間化為粉齏。人們說，全世界都打算實現俄國作家們的意識形態，這些作家們和我前面說過的一樣，也以不讓天國在塵世實現，以及反對所有的西歐小資產階級精神的意識形態為其做人的責任。

沙皇們原本牢牢地坐在王位上，但突然，魔棒一揮，他們就從人們頭腦中被驅趕走了。我知道這一類的解釋如今不再時興了，歷史的聖經哲學對現代精神而言，也沒多大意義，同樣，我也不會太過堅持我所作解釋的科學價值……。假如人們願意，就在象徵的意義上接受它吧。但這象徵絲毫沒有改變事態。我們面對的是無可爭辯的事

實，也就是說在一九一四年，人們都失去理性了。也許憤怒的主變亂了語言，也許有一些自然的原因，但不管怎麼說，這些人，這些二十世紀有文化的人，沒有任何動機，卻製造了聞所未聞的大災難。君主們殺死了君主制，民主黨人殺死了民主制，在俄國，社會主義者在殘殺，而且，差不多殺死了社會主義和革命。以後還會發生什麼事？盲目的時期結束了嗎？憤怒的主不再使人類着魔了嗎？還是我們仍將長期生活在彼此不和之中，繼續着可怕的自我毀滅？

在俄國時，我不停地向自己提這個問題，但我不知道怎麼回答。在俄國，我們看不到外國的報紙，除了一些轟動一時絕不可靠絕無根據的新聞和喧囂以外，什麼都沒有。但我們的一般印象是，歐洲總會走到其困難的盡頭，她也許還會走向幸福。換句話說，在俄國，就像在久遠的聖經時代，主已經成功地變亂了語言，將人們帶入了完全野蠻的狀態，而在歐洲，人們卻停了一會兒，進行了反思，躲過了主[的憤怒]，再一次動手建造巴別塔；或者不用象徵的方式，只用簡單明白的話來表達，俄國人那些徹底俄國式的超越歐洲的夢想，在其傳統、在其健康穩固的政治、經濟和社會之堅定性面前破碎了。

我說得對嗎？

在西方作了短暫居留之後，我已不能充分把握我的判斷。但我提出這問題，乃是因為必須提這樣的問題。我以為，被布爾什維克主義，被俄國社會主義者們視為自己傑作的，肯定是反對一切進步思想和社會組織的力量的作品。布爾什維克主義始於破壞，除了破壞，一無所能。假如列寧和他的同志們(其良知與無私容不得懷疑)頭腦足夠清楚，能明白他們自己已經成了歷史手中的玩偶，會在他們

手中實現非但與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直接對立，而且與幾十年內被壓迫階級處境的任何改善直接對立的計劃——他們就會詛咒捉弄人的命運把俄國政府權力交給他們的那一天。當然，他們也會明白，他們那超越歐洲的夢想——假如他們永遠要想實現它——並不意味着勝利，而是社會主義的廢墟，造成的是因遭受各種巨大災難而精疲力盡的人民。

但顯然列寧並不會看到這一點。命運很善於向不了解它的人掩藏其意圖。它騙過了君主，騙過了歐洲的領導階級，也騙過了對政府事務一無所知的俄國社會主義者。西方的命運就是成為其幻想的受害者並且遭受俄國的結局？抑或命運已經吃膩了壞人？

只有未來能回答這個問題——也許不太遙遠的未來。

在俄國，年輕人和智力不太高的人自信地預言布爾什維克主義將傳遍全世界。

Blank Page

此頁為空白頁